

破 與 立

—— 審視東歐民主轉型的理論 ——

吳玉山*

摘 要

在短短的兩年之內（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民主化的浪潮席捲東歐地區，其變化之快速與巨大，超乎任何人想像之外。以往的比較共產主義理論和基於拉美和南歐經驗的民主轉型理論都不能對此提出有效的解釋。面對這種理論的真空，研究比較政治和比較共產主義的學者紛紛創立新說。本文的目的即在於審視東歐民主轉型的文獻，並提出修正的功能論以爲補充。

本文的焦點在於評論以各種宏觀條件來解釋東歐民主化的理論。目前學界建構理論的方向大致有四：第一是強調經濟及社會條件造就了政治改革的力量，第二是強調官方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功能完全喪失，第三是強調統治菁英發動改革，第四是著重於國際環境的影響。這四個途徑主要是照造成東歐政治變遷的動力根源來分類的。然而僅僅是了解了這些因素是來自於那一個根源，並不能使我們明白各種因素間的關係究竟是如何。這樣對我們解釋東歐政治變遷的現象助益並不是很大。本研究因而提出改良的功能論作為研究的基本框架。

改良的功能論將各種影響政治穩定的因素聯繫在一起，使得各個因素不再是孤立和彼此分離的條件，而是形成一個解釋的整體。這樣做使得我們不必執著於特定的條件，而可以專注於各種不同條件對政權統治機制所造成的淨效果。對於不同的國家（例如發動者的波蘭和追隨者的捷克斯洛伐克），我們可以強調不同的條件，而不必受某一種動力根源途徑的拘束。事實上，改良的功能論正可作爲比較不同政治體系如何倚重不同統治機制以達成政治穩定的理論框架。其廣闊的適用性甚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在短短的兩年之內（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民主化的浪潮席捲東歐地區，其變化之快速與巨大，超乎任何人想像之外。往昔學術界對共產政權的統治機制以及共產主義國家中社會與國家的關係缺乏正確的理解，因而對此變局欠缺解釋能力。面對這種理論的真空，研究比較政治和比較共產主義的學者紛紛創立新說。本文的目的即在於審視東歐民主轉型的理論，並提出修正的功能論以爲補充。

東歐的民主化型態概可分爲兩大類，一是發動者，包括波蘭和匈牙利，另一是追隨者，包括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東歐民主化的發展在時間上有其一致性，此一現象代表各國在舊體制下彼此緊密相連。然而，另一方面，各國進入關鍵點的預備期卻差異極大^①。任何理論的研究，必須關照此一特殊現象，也就是必須對發動者和追隨者國家提出不同的解釋。

壹、描述分析與理論詮釋

當前對東歐民主轉型的研究可概分爲兩種型態：描述分析與理論詮釋。前者通常是出於資深的記者或評論家，後者則是出於區域研究專家或比較政治學者。在描述分析的名著當中，首推 Timothy Garton Ash 的 The Magic Lantern^②。Ash 出身於牛津大學，專攻歷史，能說多種東歐語言。他對於東歐的報導分析廣受學界推崇。Ash 所著 The Uses of Adversity 曾獲得一九八九年的全歐論文獎。The Magic Lantern 是 Ash 在一九八九年親至華沙，布達佩斯，柏林，以及布拉格目睹民主浪潮席捲東歐各國所做的報導分析。Ash 並曾親自參與在捷克由 Vaclav Havel 所領導的不流血革命，故其報告極有價值。

The Magic Lantern 是一九八九年東歐遽變的紀實，BBC 資深東歐記者 Misha Glenny 所著的 The Rebirth of History: Eastern Europe in the Age of Democracy^③ 則是對東歐民主革命後的政治，運用第一手的資料所做的深度分析。Ash 所側重的是民主化的啓始及過程，而 Glenny 所注重的則是民主化的鞏固。儘管此二人的報告都具有豐富的經驗基礎，但是因

① Paul G. Lewis,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Coexistence 27 (1990), pp.245-267.

② Timothy Garton Ash, The Magic Lanter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③ Misha Glenny, The Rebirth of History (London: Penguin, 1990).

為他們無意於理論的創作或驗證，所以對於東歐民主化現象的解釋並不能符合社會科學的要求。從這個角度來看，此類報導分析的意義，主要在於提供有用的經驗素材，便利理論的研究。

貳、比較共產主義理論

傳統的比較共產主義理論 (comparative communism literature) 是研究東歐政治變遷的自然起點。比較共產主義一向是以蘇聯的政治發展作為主要的經驗根據。因而對史達林掌政的時期，Carl J. Friedrich 和 Zbigniew Brzezinski 即發展出極權主義模式 (totalitarianism model)^④。這個模式固然相當正確地描繪出蘇聯在史達林時期和東歐各國在一九四〇年代末以及一九五〇年代初的社會實況，但卻沒有提出極權體制如何會發生變化。它所提出的極權主義症候群：至高無上的領袖，主導一切的意識型態，作為控制樞紐的黨，恐怖統治，以及對武力，信息，和經濟的全盤壟斷，在史達林死後，程度已經逐漸降低^⑤。極權主義模式的理論意義，遂在於作為一種理念型的政治制度，一個參照點，吾人可以用來描述實際的政治狀況，和估量政治變遷的幅度。此一模式由於掌握了共產政權的特殊之處，也提供了和其他政治制度比較的基礎。最重要的是極權主義緊抓住共產政權的各種控制機制，並且強調其彼此的關聯性。這預示了此種政權的崩解很可能是因為各種控制機制的失效，以及相互牽連所造成的影響。因此極權主義雖然沒有具體地說出共產政權如何變化，它卻可以引領研究者提出關鍵性的問題。為了上述種種原因，William Odom 至今（一九九二）^⑥仍為 Friedrich 和 Brzezinski 的極權主義模式提出辯護，認為學術界至今沒有提出較之更為合適的理論。

繼極權主義模式之後，出現了如單一組織模式 (mono-organizational model) 和團體衝突模式 (group conflict model) 等新的理論，以反映赫魯雪夫和布里茲涅夫時代蘇聯較為寬鬆的政治局面，與東歐各國類似的政

^④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3).

^⑤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⑥William E. Odom, "Soviet Politics and After: Old and New Concepts," World Politics 45:1 (October 1992), pp.66-98.

治變遷。前者以 Allen Kassof (1964)^⑦, Alfred Meyer (1964)^⑧ 和 T.H. Rigby (1964)^⑨ 為重要的代表人物，後者以 Gordon H. Skilling (1966)^⑩ 和 Franklyn Griffiths (1971)^⑪ 著稱。這些理論雖然較極權政治模式更貼近蘇聯和東歐在後史達林時期的現實狀況，但也跟極權政治模式一樣，缺乏解釋變動的能力。因此一旦戈巴契夫上台，局勢發生徹底的改變，則理論又不免落於形式之後，無法解釋變動的原因，更無法提出有效的預測。最後有一派持修正主義立場的學者，例如 Stephen F. Cohen (1985)^⑫, George Breslauer (1982)^⑬ 和 Jerry Hough (1979)^⑭，他們完全排斥極權主義的概念，認為蘇聯的共黨政權已經在體制內逐漸自由化。戈巴契夫初期的表現似乎驗證了這些自由派學者的論調，然而他們無法預見共產體制改革的侷限性。一九八九年後東歐和蘇聯共產政權的崩潰是這些學者所始料未及的。

在傳統的比較共產主義理論當中，並不是只有極權主義之類的靜態模式。有一些動態的理論對於解釋一九八九年的劇變仍保有相當的價值，將在以下的討論中一併述及。

參、民主化的研究

東歐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革命是舉世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在東歐發生劇變之前，拉丁美洲和南歐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對應於此種重大發展，學術界產生了關於民主轉型的理論 (political transition literature)。

^⑦Allen Kassof, "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World Politics 16:4 (July 1964), pp.558-75.

^⑧Alfred Meyer, "USSR, Incorporated," in Donald W. Tredgold, 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SR: An Exchange of View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⑨T.H. Rigby, "Organizational, Traditional, and Market Societies," World Politics 16:4 (July 1964), pp.539-57.

^⑩Gordon H. Skilling,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18:3 (April 1966), pp.435-51.

^⑪Gordon H.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⑫Stephen F. Cohen,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⑬George Breslauer, Kh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s: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2).

^⑭Jerry Hough,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和比較共產主義理論一樣，新興的民主轉型理論是基於特定國家的經驗，再推而廣之，宣稱具有一般的適用性。然而拉丁美洲及南歐各國在制度上和東歐差異極大，因此把民主轉型理論類推適用到東歐各國時必須格外小心。舉例而言，拉美和南歐是由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轉移，而東歐各國卻是由極權體制向民主體制轉移。拉美和南歐多採行混合式的經濟，在民主轉型之後，經濟的變化並不大。東歐各國卻必須在民主化的同時，一併進行經濟改革，帶來政改和經改之間複雜的牽連。在某些東歐國家，甚至還有極嚴重的民族問題，如此造成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元轉型。此類狀態是拉美和南歐所未曾經歷的。最後，拉美和南歐國家的民主轉型或多或少和軍人政權的退讓有關。軍人固然擔心一旦喪失政權，會被文人政府報復，但軍人畢竟為國家所不可或缺，所以軍人退回軍營之後，仍有固定的職位保障。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卻不然，他們喪失了政權之後，便無處可歸。所以雖然某些東歐共黨領導了民主改革，但絕大多數的共黨領導者卻極力抗拒，最後只有被社會的民主浪潮所淹沒。因為舊政權的型態不同，造成了拉美南歐和東歐轉型過程大相逕庭。

另外一個運用民主轉型理論於東歐轉型的困難在於：這個理論太注重轉型的過程 (process)，對於條件 (preconditions) 的分析並不充分。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Schmitter 和 Lawrence Whitehead 所合編的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86)^⑯ 就相當程度地表現出此種傾向^⑯。然而東歐（以及蘇聯）轉型的特質正在於其特殊的文化、制度和國際條件。一個對於條件不敏感的理論，顯然是不適於用來作為研究東歐的主要架構。當然這並不是說民主轉型理論沒有可茲借鏡之處。有一些研究蘇聯和東歐的學者非常願意採用基於拉美和南歐經驗的民主轉型理論，例如 Russell Bova (Bova 1991)^⑰ 對後共

^⑯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a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⑰ Adam Przeworski 為過程論提出了方法上的辯護，認為宏觀條件充其量只不過是一些民主化的限制 (constraints)，無法決定其發展和最終的結果。見 Adam Przeworski,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a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Universtiy Press, 1986).

^⑱ Russell Bova,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World Politics 44:1 (October 1991), pp.113-38.

產主義轉型的分析便是。

肆、研究東歐民主轉型的主要課題

一般而言，學術界對東歐民主轉型的主要關切在於：第一，民主化如何成功；第二，新興的民主政權如何鞏固。以年代來區分，東歐的民主變革多發生於一九八九年，而新興的民主政體多在一九九〇年大選後建立。因此民主化成功的研究，多集中於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時期；而民主鞏固的研究則多集中於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時期。區分這兩類的研究有其重要性，因為此二者所代表的意義並不相同。前者基本上是一個革命研究^⑩，即使取代舊政權的新體制不能長久存續（如許多觀察家預測東歐會走上戰間期的老路，在政經轉型的雙重挑戰之下，由威權體制取代新興的民主體制），但被認為是統治力最強的共黨政權在一夕之間喪失權力，其意義即非比尋常，蓋此一事實驗證了傳統比較共產主義理論的嚴重缺陷。至於民主鞏固的課題，則關係到東歐未來的安全與福祉，又是研究政治發展和政治穩定的最佳題材。二者各具重要性，故宜分別對待之。

另外一個清楚區分民主化成功和民主鞏固的原因是兩者的造成因素並不相同。例如根據 Laszlo Bruszt 和 David Stark 對匈牙利民主轉型的研究 (Bruszt and Stark, 1992)^⑪，匈牙利的民主黨派缺乏社會基礎（和波蘭的團結工聯大不相同），所以在和共黨政權談判時，不敢做任何的妥協讓步，結果反而造就了徹底的民主多黨民主制（不像波蘭的妥協式民主）。然而正由於缺乏社會支持，以及沒有強大的中介團體，匈牙利的民主政黨在取得政權之後，遲遲不敢發動社會，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人民也普遍對政治厭倦，新民主政權很快就面臨了合法性的危機。所以有利於快速及徹底的民主化的因素，反而成為民主鞏固的障礙。這個個案研究，清楚地顯示了有必要將民主化和民主鞏固劃分開。

^⑩ 雖然有些理論家堅稱東歐的民主變革其實是演進 (evolution) 而非革命 (revolution) 但這是極少數的意見，見 Kazimierz Poznanski, "An Interpretation of Communist Decay: The Role of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6:1 (March 1993), pp.3-24.

^⑪ Laszlo Bruszt and Davi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伍、東歐民主轉型的主要解釋項

不論是要解釋民主化或是民主鞏固，主要的解釋項都可以歸入兩個範疇。一個是條件，一個是過程。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文化（條件），可以解釋民主化的順利（天鵝絨革命），也可以解釋這個國家民主鞏固的前景在東歐各國中是最確定的。又如今日南斯拉夫慘烈的內戰（過程）使得交戰各國的民主化及民主鞏固都受到不利的影響。

在條件這個範疇之內，可以概括分為四個途徑：經社結構，歷史文化，菁英的發動，和國際環境。當然有些學者會綜合各種條件，開列出一張解釋民主轉型的清單，例如 Samuel Huntington 在一九八四年討論是否會有更多國家成為民主政體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時^⑩，就提到了經濟社會層面，歷史文化層面，和國際環境層面等各方面促進民主的因素。然而清單式的解釋有其侷限性。它不能告訴我們各種條件和因素之間的比重和關聯。因此在下述的文獻評述當中，仍然針對各個主要途徑加以討論。

在過程這個範疇之內，重要的解釋項包括轉型的速度，暴力使用的程度，和階段 (stage) 與路徑 (path) 等。這種研究方法是基於拉美和南歐的經驗，並將其適用到東歐的政治發展上來。如上所述，完全沒有配合條件背景的過程分析，是不適合做為研究東歐和蘇聯政治變遷的架構的。然而對於過程的研究，尤其是介於條件決定論 (determinism) 和唯意志論 (voluntarism) 之間的途徑－依賴模式 (path-dependent model) 却可以相當程度地吸納條件論的優點。由於研究東歐政治轉型的理論家絕大多數都集中於討論條件，因此以下的文獻評述，將主要針對闡釋東歐民主化條件的各種重要理論，加以歸納討論。

陸、經濟與社會條件

這個途徑有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強調經濟發展以及由其所帶來的社會變遷會產生要求民主的壓力。另一種則是主張人們的經濟生活境遇決定了他們對政權的態度。因此當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沒有辦法

^⑩ Samuel P. Huntington,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2 (1984), pp.193-218.

滿足人民的物質需求的時候，民主的壓力就大增，蓋在東歐人民所羨慕的西方各國，豐富的物質生活都是伴隨著民主的政治體制。前者所指的是一種長期性的，由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政治文化變遷。民主在此被視為一種內在的價值。後者則以民主為一種工具，是達到豐裕物質生活的手段。成功的經濟發展帶來前一種要求民主的壓力。失敗的經濟政策則帶來後一種壓力。

認為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是現代化理論的一貫思路。從政治經濟學的鼻祖 Adam Smith，英國的社會學大師 Herbert Spencer，將歐洲社會學傳入美國的 Talcott Parsons，政治社會學著名學者 Seymour Martin Lipset，到專研民主化的當代政治學大師 Samuel Huntington，無一不認為經濟的發展會帶來社會的劇烈變遷，價值的多元化，以及用民主制度整合各種利益的要求。現代化理論也進入了傳統的比較共產主義文獻當中，成為至今仍具有相當解釋力的一種動態模型。其中最著名的當推 Richard Lowenthal。Lowenthal 認定共黨對烏托邦意識型態的執著終會不敵經濟發展的需求，其政治體制終不免要向自由化和多元化轉型。在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1970)^㉑，"On 'Established' Party Regimes" (1974)^㉒，和 "The Post-Revolutionary Phase in China and Russia" (1983)^㉓當中，Lowenthal 為現代化理論在共黨國家的適用，做了最有力的陳述。對於一九八〇年代末蘇聯和東歐的劇變，有 Moshe Lewin 在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1991)^㉔中賡續此一現代化理論的傳統，以城市化，專業化，以及一般人民教育水準的提高來解釋民眾對自由的要求。彼謂：“城市是民主的搖籃”，可謂此一途徑的最佳說明。而 Lucian Pye 在一九八九年美國政治學會的年會中，以會長身份所做的演說中，更明白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使“現代化理論終於獲

^㉑Richard Lowenthal,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㉒Richard Lowenthal, "On 'Established' Communist Party Regim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7:4 (Winter 1974), pp.335-58.

^㉓Richard Lowenthal, "The Post-Revolutionary Phase in China and Rus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6:3 (Autumn 1983), pp.191-201.

^㉔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得了肯定” (the vindica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㉕。

將現代化理論適用於東歐有一個特殊的困難，那就是這個理論通常假設中產階級 (bourgeoisie) 是推動民主化的主力。現代化帶來了中產階級的興起，而中產階級自發地產生了對民主的要求。例如 Barrington Moore 在其名著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㉖ 中即以獨立而強大的中產階級作為民主出現的必要條件。然而在共黨統治下的東歐，一切重要的生產工具都歸國有，並沒有真正的中產階級。蘇聯模式的現代化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和五年計畫達成的，而不是依靠私有制和市場。財產權的不同使得東歐缺乏歷史上在西方推動民主化的主要階級^㉗。這似乎意味著在列寧主義制度之下民主將難以發軌。可是事實並非如此。東歐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波蘭的團結工聯—正是產業工人在知識分子的帶動下為實現民主所成立的組織。從這裡可以看出，現代化理論必須捨棄將中產階級作為民主唯一動力泉源的說法，而將現代化對各階層的影響都納入其理論之內，方足以解釋東歐的現象。

經社條件對民主化的影響並不止於現代化論者所述一途。在東歐，經濟成長的趨緩以及物質生活的困窘確實是一般人民對體制失去信心的重要因素。許多學者提出，中央計劃經濟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在各種生產因素尚未充分動員的擴張成長時期 (extensive growth period) 確實可以以強制的方式調動因素，帶來高速度的經濟成長。可是一旦生產因素已經充分就業，經濟成長就必須有賴於生產力的不斷提高。這是集約成長時期 (intensive growth period) 的必然現象。東歐各國在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逐漸進入集約成長時期，但是中央計劃經濟在配置資源，激勵工作熱忱，傳遞信息和創新生產科技^㉘等方面都沒有市場和私有制來得有效率，於是生產力不見提高，而經濟成長也漸次趨緩。在此期間，蘇聯的低價能源供應，以及西方的大量借貸都曾發生延緩經濟危機到來的效用。但是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從蘇聯以降，各社會主義國家普

^㉕Lucian W. Pye,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arian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1 (March 1990), pp.3-19.

^㉖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1966).

^㉗Paul G. Lewis,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P.253.

^㉘W.W. Rostow,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A Technological Time Warp,"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遍遭受經濟衰退的衝擊。這種狀況在和西歐各國對比之後，顯得異形嚴重。由於東歐共產政權始終無法以體制內的改革來挽救其經濟^㉙，人民終於要求推翻共產制度。採取這個途徑的如 Nigel Swain (1992)，他作為一個同情社會主義的左派經濟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匈牙利共黨政權的崩潰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所帶來的經濟危機^㉚。在各東歐共黨政權當中，匈牙利和波蘭是民主化改革的先行者，而他們的經濟狀況也特別嚴重。相反地，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的經濟在東歐相對說來是較好的，而他們的共黨領導階層也較能抗拒民間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從這裡可以看出，經濟狀況和政治改革之間的確有密切的聯繫。

如果現代化和經濟衰退都可以刺激人民對民主的要求，那麼在成功的現代化（經濟長期成長，都市化及工業化，大眾傳播普及，教育水準提高）之後如果出現經濟狀況的惡化，將會觸動長短期兩種對民主的要求，造成對現政權最大的壓力。東歐各國即普遍具有這個背景。這兩種趨勢可能有不同的承載者 (carrier)。因為現代化而產生的民主要求很可能主要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身上。而因為本國經濟衰敗和艷羨西方的物質生活而追求民主的，可能主要是工農大眾。因此所謂兩種民主要求的匯合，其實是指社會上的不同階層為了不同的經社因素而同時追求民主。波蘭從一九七六年開始有知識分子和工人的結合^㉛，最後造就了團結工聯，推翻了波共政權。這兩股民主力量的背後，就反映了兩種經社條件的作用。

^㉙Richard Ericson, "The Classical Soviet-Type Economy: Nature of the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5:4 (Fall 1991), pp. 11-27; Thomas A. Wolf, "The Lessons of Limited Market-Oriented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5:4 (Fall 1991), pp.45-58.

^㉚Nigel Swain, Hungary: The Rise and Fall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92).

^㉛Jacques Rupnik, "Dissent in Poland, 1968-78: the End of Revisionism and the Rebirth of Civil Society," Rudolf Tokes, ed.,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柒、文化、歷史與意識型態的因素

著名的比較政治學家 Giovanni Sartori (1966) 對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的現代化論觀點曾提出適切的批評^㉒。他提出經濟發展和民主這兩個變項之間的相關並不表示因果；同時正確的因果關係可能是民主導致經濟發展。即令我們承認最富有的國家多行民主，而最貧窮國家鮮有採行民主體制者，在這兩者之間仍有一大片灰色區域，其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和是否實行民主缺乏一定的關聯。面對這種情形 Harry Eckstein 特別為文化途徑 (culturalist approach) 請命（一九八八）^㉓，蓋特定國家政治文化和民主的相容性在此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Eckstein 認為文化是由各種社會化的途徑學習獲得，其意義在於導引 (orient) 個人的行為。人在各種情境之下，不是直接對刺激做反應，而是透過文化所賦予的意義（認知，情感，評價）來決定其行為。雖然文化的變動通常都是漸進的，然而文化論的解釋並不必然預期原政治體系的持續。在文化沒有巨大變動的情形之下，政治革命仍然可以發生。不過文化論者認為，在革命性的政治變遷之後，文化並不能隨之而變。亦即文化與體系的重新契合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樣的說法對東歐政治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意義。因為在東歐各國共產黨掌握住政權之後，雖然努力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灌輸到人民心中，但文化的變遷既然緩慢，在實存的政治文化和新建立的政治體系當中必然存在持續性的衝突。如果官方的意識形態沒有辦法真正深入人心，這個矛盾就會成為下一次劇烈政治變遷的種子。

在此我們必須做一個概念上的澄清。用文化論的觀點來理解東歐的政治發展必須要區分兩個不同的文化領域。一個是官方的意識形態，另一個是本土的政治文化。文化論者以為東歐共黨政權的崩潰是由於官方意識形態的破產，以及本土政治文化的復活。前者主要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共黨統治階層對官方的意識形態喪失信心。後者則表現為東歐人民對本國歷史文化的強烈認同，尤其是對歷史上若干時期本國主權獨立以及

^㉒Giovanni Sartori, "Democracy," in Davi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4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㉓Harry Eckstein, "A Culturalist Theory of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3 (September 1988), pp.789-804.

採行民主體制經驗的回顧與眷戀。採用第一個觀點的多半是東歐學者（例如 Agnes Horvath and Arpad Szakolczai 1992^㉔ 及 Adam Przeworski 1991^㉕）或者是西方學者但主要引用東歐人士的看法（例如 Giuseppe Di Palma 1991^㉖）。他們對於合法性的問題尤其措意。在他們看來，共黨的意識型態最初確有若干賦予政權合法性的作用。此時共產黨人對他們的統治視為當然。這是由上到下的合法化 (legitimation from the top)。一般人民雖不願接受共黨的統治，但只要統治者相信本身權力的正當性，此一體系仍可維繫。只不過一旦當統治的共黨菁英本身也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型態，或是當共領袖將其意識形態作了重大修正，致使共黨壟斷政權的合法性不再存在的時候^㉗，他們就喪失了強制鎮壓反對力量的意志。一般人民由於長期被迫說謊，言行不一，心理壓力極大，亟思擺脫此種困局，故在統治者力量削弱的時候，自會起而反抗。人心對真理 (truth) 的渴望，以及對過道德生活的自然需求，使得共黨統治的基礎為之崩潰^㉘。這種現象在東歐各國普遍存在，不過表現地最清楚的是波蘭。在波蘭，共黨統治的權威早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便已崩潰。波共是靠物質利益和強

㉔Agnes Horvath and Arpad Szakolczai, The Dissolution of Communist Power: The Case of Hunga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㉕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㉖Giuseppe Di Palma, "Legitimation from the Top to Civil Society: Politico-Cultural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World Politics 44:1 (October 1991), pp.49-80; and Giuseppe Di Palma, "Why Democracy Can Work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Democracy 2:1 (Winter 1991), pp.21-31.

㉗例如 Nikita Khrushchev 在蘇共第二十大所做的貶史演說就對共黨意識形態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見 Ken 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Jowitt 原本以對列寧主義的自然演進階段分析著稱，他將一個列寧主義政權的發展階段分為轉型 (transformation)，即肅清反側，求取軍事和政治上的勝利；鞏固 (consolidation)，即社會已經臣服，卻尚未被從文化及意識形態上加以徹底改造，而必須加以隔絕和鎮壓；和吸納 (inclusion)，即社會已被改造，可以被政權所容納。然而在解釋列寧主義的集體滅亡 (Leninist Extinction) 時，Jowitt 却特別強調 Khrushchev 的修正主義對列寧主義是致命的打擊。關於其理論，見 Ken Jowitt, "Inclusion and Mobilization in European Leninist Regimes," World Politics 28:1 (October 1975), pp.69-96; "Soviet Neotraditionalism: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of a Leninist Regime," Soviet Studies 35:3 (1983), pp.275-97.

㉘Daniel Chirot, "What Happened in Eastern Europe in 1989,"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制力量勉強維持住政權。當在一九八一年領導實施戒嚴，鎮壓團結工聯的賈魯塞斯基將軍 (General Wojciech Jaruzelski) 都不願命令部隊向群眾開火之後，波共就只剩下民主改革之途。

和共產黨意識型態破產相對應的是東歐各國本土政治文化的興起。這裡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個是在傳統政治文化中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分量；第二個是在歷史文化中對俄國仇視的程度。前者常被援引來解釋何以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轉型起步地那麼遲，速度卻那麼快，程度上那麼徹底，而過程卻又如此平和。如果不是大眾在心理上早已經有了行使民主的渴望與準備，也就是其政治文化已經是一個發展成熟的民主型政治文化，焉克至此 (Judt 1991)^⑨。徵諸捷克在歷史上的發展及西歐化的程度，這個論斷無疑具有很大的解釋力。同樣的文化解釋，也可以適用於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斯時捷克的經濟改革發展成政治改革，變動的原動力竟然出自於共黨內部。和一九八〇年代末蘇聯及匈牙利的政治改革不同的是^⑩，捷克的統治菁英發動自由化及民主化的目的並非是動員社會力量來打擊保守派，而是順應社會的需求和本身道德的迫促。布拉格之春被視為捷克自十九世紀以來自由化傳統的再一次發皇，是捷克在戰間期第一共和（一九一八至三八）民主精神的延續^⑪。

東歐各國本土政治文化中另一個重要的變項是對俄國的態度。在這裡我們又必須做更進一步的區分。大部分的東歐國家在歷史上和俄國交惡，而列寧式的共產主義又源自俄國，因此各國的共黨政權常被視為莫斯科的傀儡，受到各國人民基於民族主義的反對，波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⑫。不過保加利亞卻是一個例外。從一八七八年聖斯泰法諾條約開始，俄國就對保加利亞的獨立和擴張多所翼助。所以保國民間對俄國的觀感遠較東歐其他國家為佳。保共政權因之不會因為和莫斯科親近而喪失合

^⑨Tony R. Judt, "Metamorphosis: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zechoslovakia,"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⑩Yu-Shan Wu, "The Linkage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A Supply-Side Explanation." Annuals 507 (January 1990), pp.91-102.

^⑪David Paul, The Cultural Limits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ocialist Czechoslovak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ch.5; H. Cordon Skilling, "Czechoslovak Political Culture: Plur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in Archie Brown,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munist Studi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85).

^⑫Joseph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法性。這也解釋了何以保加利亞在東歐各國中對蘇聯一貫是最順從的。另外在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喬塞斯古和狄托則有效地動員了民族主義的力量，作為抗拒莫斯科的籌碼。在以上三類的例子中，我們發現當民間和共黨政權對蘇聯霸權的態度不一致時，政治文化的因素傾向於削弱政權的合法性。一九八九年在波蘭和匈牙利的政治劇變，相當程度是兩國反抗俄國民族主義精神昂揚的表現。在 Timothy Ash 等人對這些歷史性事件的紀實當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政治文化在東歐變遷中雖然佔據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政權的合法性卻難以用精確的方法估計出來，這是西方的觀察家多數著重於經濟和社會條件的原因^{④3}。不過政治文化固然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它卻是一個長期存在並且不容易改變的事實。東歐的革命性變遷何以在一九八〇年代末發生，而不是早十年或晚十年，顯然必須用對時間更敏感的變項來解釋。

捌、統治菁英的發動

傳統的比較共產主義理論向來傾向於強調國家的自主性。在這個理論的框架底下，統治菁英自然構成研究的焦點。在這裡基本的假設是菁英變動是造成政治變動最重要的原因。Seweryn Bialer 在其名著 Stalin's Successors^{④4} 中，將一九五三年以後蘇聯的巨大變動歸因於史達林的死亡，並預言蘇聯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必然會產生政治上的另一次劇變。這是因為當時以布里茲涅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階層是最後一批由史達林拔擢進入高層政治核心的。他們在三〇年代大整肅時以壯齡躋身權力中心，到八〇年代時，雖仍然緊握權力，卻不免老成凋零。高層的人事大換血在蘇聯及東歐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內，必然引發整個體制的重大變動。基於同一個原因，Jerry F. Hough 在 Soviet Leadership Transition^{④5} 中，詳細地分析了蘇聯各個權力系統中，不同世代間的差距。這些學者

^{④3}Daniel Chirot, "What Happened in Eastern Europe in 1989?"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P.22.

^{④4}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④5}Jerry F. Hough, Soviet Leadership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0).

都將蘇聯式政治體制的變動和領導菁英的變動聯繫在一起。他們的預測果然被後來由戈巴契夫所領導的激烈政經改革所證實。

在這裡問題的核心顯然是繼承。然而繼承當然不是政治改革的充分條件。究其實，通常在共黨國家中由統治菁英所發動的政治改革，是出於其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繼承提供了權力鬥爭的時機，使得競爭權力的各方有可能以政治改革的方式來發動社會力量，剷除其反對勢力。在此自由化和民主化是權力鬥爭的工具。既然如此，在沒有明顯的繼承危機，卻有劇烈權力鬥爭的場合，由上而下的改革仍有可能。如果沒有這個上層權力鬥爭的背景，則由於共產極權體制對社會的統治是相當有效的，民主變革就不可能產生。又由於共產領袖對民主沒有內在的信仰，所以他們對政治改革的支持只可能是基於工具性的考量，也就是為了本身在權力鬥爭中獲勝，不惜改變遊戲規則，援引社會勢力，來打倒自己的政敵。徵諸蘇聯和匈牙利的民主化軌跡，可見此論斷的有效性^{④6}。

菁英途徑的一個重大的理論性問題是究竟有沒有一些特定因素可以促使菁英從事政治改革。此一點如果不加以判定，菁英途徑將流於完全的意志論。在 "The Linkage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Socialist Countries" ^{④7} 中，Wu 認為會觸動政治改革的共黨內部權力鬥爭是由於黨內各派系對經濟改革的立場不一致，有些改革派便放手發動群眾，製造壓力，迫使保守派屈服。在以拉美和南歐經驗為主的民主轉型理論中，一方面注重菁英的角色，一方面對於菁英願意發動政治改革的動機卻採取了唯意志論。這在 O'Donnell 和 Schmitter 的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④8} 中表現地非常清楚。他們認為菁英的傾向，算計和約定大體決定了民主化的開端，而菁英之所以自願放棄對權力的壟斷，有可能是為了以後在歷史上的評價。這個說法等於是對以往研究民主化中結構主義的反動，尤其對曾以結構論的官僚權威主義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而名重一時的 O'Donnell 而言更是如

^{④6} Yu-Shan Wu, "Nationalism,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Hungary, and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3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ember 1-5, Washington, D.C.

^{④7} 同註^{④5}。

^{④8}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此^④。菁英主義加上唯意志論使得民主轉型由開端到完成充滿了不確定性，這對於我們了解東歐民主化的理論意義極微。

玖、國際環境的影響

國際環境對東歐民主化的影響可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西方將其富裕及民主的生活形象傳遞到東歐，造成巨大的相對剝奪感，以及要求改變的強大社會壓力。另一個方向是蘇聯為了增加其體制的競爭力而發動政經改革，造成東歐各國保守政權的危機。從莫斯科來的壓力因而和人民對改革的要求匯合。而當民主改革在一個東歐國家發生的時候，其周圍國家都受到鼓舞。於是骨牌效應顯現，各國共黨政權連續倒台。簡言之，東歐共黨是在東西雙方兩重壓力底下崩潰的。

在國際環境的各種因素當中，最被強調的是戈巴契夫所起的作用^⑤。他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聯合國宣布從東歐撤軍的演說，在一九八九年六月要求波共接受選舉失敗的電話，以及在十月鼓勵東德共黨二號頭目Egon Krenz不要服從德共第一書記 Erich Honecker 的命令向萊比錫示威群眾開火的舉動，都非常明顯地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 Charles Gati 在 *The Bloc That Failed* (1990)^⑥ 當中，即以戈巴契夫為一九八九年東歐革命發生的主要因素。

最能夠證實國際因素在蘇聯和東歐民主變革中的重要性的是這些事件發生的集中程度。Timothy Ash 曾做過一個著名的觀察。波蘭一共花了十年才實現民主。同樣的過程在匈牙利費了十個月。在東德是十個星期。而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則只需十天。事實上從東德開始，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的民主變革都是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到十二月的短短三個月中發生。號稱最具有獨立性的阿爾巴尼亞也不過多支撐了一年。而連蘇聯都不免於在一九九一年底傾覆。如果將蘇東的快速民主化和從一九七三年開始橫亘十年不止的拉美和南歐的民主潮相比，就可

^④Nancy Bermeo, "Rethinking Regime Chang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1990), pp.359-377.

^⑤D.W. Spring, *The Impact of Gorbachev: The First Phase, 1985-90* (London: Pinter, 1991).

^⑥Charles Gati, *The Bloc That Failed: 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以看出國際因素在蘇東事例中的特殊重要性。很明顯地，如果是國內因素佔主導地位的話，民主的浪潮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席捲歷史，文化，和經濟發展背景迥異的蘇東各國。

既然認知了國際因素的重要性，我們仍必須探索國際因素產生國內影響的機制 (mechanisms)。這些機制可分為三類：挑戰 (challenge)，依賴 (dependence)，和示範 (demonstration)。挑戰指的是因為國際上政治，軍事，和經濟的競爭，促使本國從事政策或制度上的變革。依賴指的是外國藉著對本國的影響和控制，造成本國的政策和制度符合其利益與價值。示範指的是本國眼見外國的進步與發展，因而提升了人民的期待，或學習外國的制度。這三種狀況並不是彼此相互排斥的。通常在一個具體的事例當中，會有不只一種的機制發生作用。

東歐各國民主化在時間上的集中性正是基因於強大的國際影響機制。挑戰（和美國的世界霸權之爭）是蘇聯發動改革的主要動機。東歐各國對蘇聯和西方的雙重依賴是使各國共黨政權遭受巨大壓力，而不得不在關鍵時刻向社會的民主要求讓步屈服的主要因素。戈巴契夫抽離了蘇聯對各國共產政權的武力支持，而西方國家則藉著大量貸款控制了東歐的經濟命脈，從而限制了共黨政權面對人民示威時所能採取的政策。在這雙重壓力之下，共黨領袖只有妥協讓步一途。示範效應是在一個接著一個的東歐國家中帶來了期望昇高的革命，並且使得共黨政權在潮流下失去反抗的意志。例如匈牙利的圓桌談判很清楚地是受到波蘭的影響。又如東德何內克政權的垮台使得一向以東柏林馬首是瞻的捷克共黨政權頓時喪失抵抗的意志。(Banac 1992)^⑫ 在 Bruszt 和 Stark 對匈牙利民主轉型的討論當中 (Bruszt and Stark 1992)^⑬，指出共黨統治菁英也會相互學習在民主化的潮流當中求生存的模式。例如匈牙利的共產黨在改革派掌握政權之後，便急速推動民主改革，希望在反對力量尚未集結之前，憑藉本身的組織力量來獲取第一次民主選舉的勝利。匈共雖然因為沒有能夠掌握圓桌會議的進度和錯失時機終而喪失政權，仿效匈共的保加利亞共黨改革派卻在第二年的民主大選中獲勝。羅馬尼亞的共黨也在喬塞斯古失敗後以救國陣線的名義推動多黨選舉並且贏得多數，繼續掌握政權。這些都是示範作用的效應。

^⑫ Ivo Banac, "Introduction,"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⑬ 同註^⑩。

拾、改良的功能理論 (modified functional approach) 的詮釋

以上我們談到四個研究東歐政治變遷的途徑：經濟社會途徑，歷史文化意識型態途徑，統治菁英途徑，和國際環境途徑。這四個途徑主要是照造成東歐政治變遷的動力根源來分類的。很明顯地，這些途徑所指出的因素對東歐從一九八九年以後的重大變動都有一定的影響。然而僅僅是了解了這些因素是來自於哪一個根源，並不能使我們明白各種因素間的關係究竟是如何。每一個途徑不過是開列了一張因素清單。而把四個途徑合在一起，也不過是提出了一張綜合的大清單。這樣對我們解釋東歐政治變遷的現象助益並不是很大。

上述理論分析的方法最大的缺點就是他們是由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s) 出發。如果我們從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s) 出發的話，情形便會大不相同。這就是功能分析 (functional analysis) 的途徑。功能分析是從政治穩定出發，推出政治體系維持穩定的功能要件，再觀察體系執行這些要件的情形，以解釋政治的穩定或變遷。這種解釋方式毋寧是比較貼切的，因為功能和體系表現之間的關係必然是比變動產生的根源和體系表現之間的關係為密切。

不過傳統的功能論有其侷限。從其始祖英國的社會學家 Herbert Spencer 開始，到美國的社會學大師 Talcott Parsons，以迄於著名的政治學者 Gabriel Almond，都提出了他們所認為的功能要件。然而這些功能（例如利益的表達，interest articulation，和利益的整合，interest integration）多半是西方政治體系所執行的，未必是所有的政治體系所賴以維持的必要條件。即使是功能論的代表之作，一九七一年由 Leonard Binder, Lucian W. Pye, James S. Coleman, Sidney Verba, Joseph Lapalombara 和 Myron Weiner 等所合編的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④，也是以相當武斷的方式提出了五種危機（即不能履行功能要件的狀況）。究其實，Binder 等人所缺乏的是一個理論框架，來建立各種功能條件和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

^④Leonard Binder, Lucian W. Pye, James S. Coleman, Sidney Verba,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這樣的一個理論框架可以在 Amitai Etzioni 於一九六四年所著的 Modern Organizations^㊂ 中找到。Etzioni 認為一個組織要想維持對其成員的控制，可以訴諸三種權力。第一種是基於物理力量 (physical force) 的強制力 (coercive power)。第二種是基於物質利益 (material benefits) 的效用力 (utilitarian power)。第三種是基於道德符號 (symbols) 的規範力 (normative power)。組織對其成員控制的最高形式就是國家要求國民的服從。在此強制力，效用力和規範力就表現為國家的公權力，經濟力，和合法性。公權力是透過如軍隊，警察等國家行政機構對強制力的壟斷來達成。經濟力則表現於國家與社會間各種有形與無形的約定 (pacts)，亦即人民對政權的支持是繫於國家的各種政策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至於合法性則通常有兩個泉源：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民族主義要求統治者和被治者屬於同一個族群。民主政治則要求統治者的地位基於被治者的同意。一個政權符合這兩個原則便具有合法性，否則便必須訴諸其他的統治機制。

這三種國家的權力或有失效的時候。公權力在國家對外戰爭失敗後可能會萎縮；經濟力在長期的不景氣後必然會降低；而一個外人所扶植的政權或經由軍事政變所建立的臨時政府極易缺乏民主政治或民族主義所要求的合法性。不過這些權力的有效性是相對於社會控制所要求的程度而言的。故而少量的公權力可鎮壓住缺乏反抗傳統的社會；低下的國民所得對物質期望不高的人民而言尚可忍受^㊃；而在民族意識不明顯或民主政治文化尚未成形的國家，外族統治或威權統治也比較能被接受。然而當人民的參照點向上移動之後，相對剝奪感便會大增，原來可以接受的政治狀況便成為抗議的對象。在這個模型當中，各種國家的權力具有互補的作用。所以一個具有強大武力（此乃相對於社會的反抗能力而言）的政權，可以在極端惡劣的經濟環境之下，遂行由異族所支持的威權統治（例如在 Boleslaw Bierut 統治下的波蘭）。或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之下，人民可以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忍受經濟困窘和獨裁體制（例如在喬賽斯古初掌權時的羅馬尼亞）。不過從長期的眼光來看，滿足人民的物質需求是一切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一旦此一權力的基礎喪失，任何政治權力終將不免於傾覆。東歐在一九八九年的革命劇變，是根源於

㊂Amitai Etzioni, Modern Organiz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4).

㊃Seweryn Bialer, The Soviet Paradox (New York: Alfred A. Knoff, 1987), P.22.

經濟持續衰弱、政府合法性早已不存在的情形下，蘇聯將其支持各國共黨統治的強制力迅速撤離的結果。

東歐的政治變遷用改良的功能論來解釋可以比用清單式的動力根源途徑來分析更能掌握要點。因為改良的功能論將各種影響政治穩定的因素聯繫在一起，使得各個因素不再是孤立和彼此分離的條件，而是形成一個解釋的整體。這樣做使得我們不必執著於特定的條件，而可以專注於各種不同條件對政權統治機制所造成的淨效果。對於不同的國家（例如發動者的波蘭和追隨者的捷克斯洛伐克），我們可以強調不同的條件，而不必受某一種動力根源途徑的拘束。改良的功能論並不會失去理論詮釋的性質，而落入描述分析的範疇，因為他是基於對國家統治機制的理論性理解。就這一點來說，他涵括了極權主義模式的優點，但卻不至於只適用在某種特定國家和政權形式之上。事實上，改良的功能論正可作為比較不同政治體系如何倚重不同統治機制以達成政治穩定的理論框架。其廣闊的適用性甚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Review of the Theories on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Yu-Shan Wu

Abstract

In 1989-1990, the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ran through Eastern Europe. The speed and magnitude of such change is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any long-time observer of that part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fail to predict this great process and its outcome. New theories aboun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is emergent literature, reflects on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offers a "modified functional approach."

One can find four explanation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first approach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prompting democratization. The second one emphasizes ideological disintegration and the resultant loss of regime legitimacy. The third one focuses on the ruling elite in initiating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The fourth one stresses international elements, such as demonstration effect, arms race, and a reforming hegemon, i.e., Soviet Union under Mikhail Gorbachev. These four approaches basically provide lists of factors that had an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However, they do not link these listed factors in any meaningful way. This research thus offers a "modified functional approach" as an altern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anchors the factors of change to a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is way, factors are weighed and integrated to provide a meaningful explanation, without being restricted by any of the approaches that fix theoretical attention on a particular source of change.

